

● 王锦贵/主编

常用社科文献

信息源

(修订本)

CHANG YONG SHE KE WEN XIAN
XIN ○ XI ○ YUAN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第二版 增订本

常用社科文献

信息源

（增订本）

NEW SPACES

清华大学出版社

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

(修订本)

王锦贵 主编

王 波 张 积 刘 耀 编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王锦贵主编. —修订本.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8

ISBN 7-5013-3153-7

I. 常…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情报检索—检索方法 IV. G2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405 号

书名 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修订本)

著者 王锦贵 主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版次 2006年8月第2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字)

书号 ISBN 7-5013-3153-7/G·665

定价 25.00 元

绪 论

文献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蕴涵重要信息的矿山,是学术交流的基本武器,是进行现代教育和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依赖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传播和交流,不仅可以系统再现以往人类创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还可以深刻揭示人类的今天、明天和未来。然而,尚未得到开发利用的文献资源,无异于虽然富有却依然是沉睡中的矿山。对于广大读者和用户而言,只有经过文献工作者的整理、加工和特定的转化形式,也就是只有经过梳理文献脉络,整合信息资源,山中之“宝”才有可能闪出光芒,也才有可能顺利地转化为“金子”。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就是文献资源举世闻名的国度。无需说现代文献是如何快速地成倍增长,即使前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古代文献,也无愧于“浩如烟海”的美誉。历来一些带有总结性的图书目录,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试以清代乾隆中期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为例,正式收入《四库全书》的典籍就有 3461 种,倘若再加上列为“存目”的 6793 种,各类古籍总计达到 10254 种之多。而这些古籍,也不过是清代乾隆中期以前现存古籍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再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为例,该目录总共收录了全国 180 多个图书馆、博物馆、文献中心等收藏单位的 8200 多种方志。而这些地方志,也不过是我国古代以来现存方志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根据学术界权威人士估计,我国现存古籍约有十多万种。古籍资源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包括古籍在内的所有文献资源是何等的丰富了。

由此可见,不要说读遍中国的所有书籍,即便是阅读其中的大部分也无法做到:这不仅是徜徉于 21 世纪以前慢节奏生活圈中的美丽幻想,也是置身于网络时代快节奏氛围中的人们势所不能。那么,究

竟应该如何开发利用祖国丰富的文献资源呢?对于当代许多人来说,熟悉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文献,并且了解常用文献资源的基本情况,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做到了这一点,岂止是可以进一步提升个人的文化层次,对于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伊始,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繁荣新时期。无论是近年倡导的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还是最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纲领,党和国家的这些重大举措都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的这一发展机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其实,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人类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90 年代之前,文化科学领域大体以分析研究为主流意识。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 15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 400 年来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反杜林论)。西方所谓发达的科学技术,也正是沿着这条清晰的“分析研究”的轨迹步步走来。但是,曾几何时,自 90 年代以来,“综合研究”作为文化科学领域中的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水平向前发展。所谓科学领域的“综合研究”,不仅仅体现于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间的彼此渗透,还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无须说生态平衡、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有社会科学层面的积极贡献,即便是当今能源领域、海洋领域、空间领域,乃至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也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参与。新形势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文献是记录知识信息的基本载体,社科文献则是侧重记录与揭示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信息的基本载体。搞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社

会科学文献为基础。没有或者缺乏相应社科文献资源而奢谈什么社会科学研究,即使身为“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可见,社会科学文献的研究,特别是社科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特定背景,基于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当时的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和同行,在社科文献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贡献,推出了一批很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在人们所熟知者中,例如旨在为开发利用社会科学文献资源而编著的《社会科学情报学》、《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社会科学信息检索教程》、《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等一批专著和大学教材。本着同样的目的和热情,我们也针对当时高等院校本科教育工作的需要,以及受众面更大的成人教育工作的特定需要,编写了这部《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我们在编写教材之初,便为本教材设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的体例内容“既与上述著作以及同类的其他著作有所不同,更与一般的工具书有明显区别”。

众所周知,社会上流传的上述著作以及同类的其他著作,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大都侧重于一般意义上的检索常识、检索技术以及检索工具方面的论述和评价。毫无疑问,由于这些著作的问世,都曾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充分地、深入地、全面地开发和利用社会科学文献的信息资源,实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就是说,要想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还必须全方位、多角度、不拘一个模式地进行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们编写的这部《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不仅是立足于社科文献,而且是立足于常用社科文献。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形式的研究,努力揭示出常用社科文献的重要价值,扩大常用社科文献资源的重要影响,进而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同时又有强烈情报信息意识的各类专门人才方面,为当今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这部教材也与一般的社科工具书有所不同。一般的工具书

内容,大多侧重于检索方法和检索技术。本书则除了介绍必要的书目工具外,研究的基点则主要定位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本书注重常用的特定文献。所谓“常用的特定文献”,即它们必须是那些不仅具有约定俗成名称、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文献,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又是经常大批量碰到、经常大批量使用的文献。这些文献内容丰富广博,信息量涉及方方面面。检索这类常用文献资源,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只要具有一般文献知识,利用一般工具书就可以查到所需资料;另一种情况则不然,即如果不具备特定知识背景,仅仅利用一般工具书便不易查到,甚至于无从下手,无法查到。无须说昔日具有“秘密”色彩而今显得日益重要的档案信息资源,目前尚未在一般工具书和广大读者中普及开来,即使在特定领域的某些既普通又常用的文献资源中,又何尝不存在明显的窘况呢?就以反映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纪传体文献“二十六史”为例,可谓受众面极广、影响极其深远的文献。然而,深藏于人物列传中的五彩缤纷的类传内容,特别是极具学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而其涉猎范围则又极为广博的史志内容等等,要想深入开发、利用其珍贵的信息资源,一般的工具书便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本书注重比较系统的文献资源专业知识的学习。古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于人”。在学习和研究常用文献信息源这一领域中,究竟什么是“金针”?是基本知识,还是方法技术,抑或是兼而有之?我们有一个基本理念:文献资源专业知识是“本”,狭义的方法技术是“末”。只有正本清源,从根基上做起,方可根深叶茂。一味的追求方法技术而忽视基本知识,这是“本末倒置”的不可取的行为。因而如果真的要在这方面寻找什么“金针”的话,我们认为,有主有次、本末兼顾,就是真正的“金针”。惟其如此,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地突出知识含量和信息含量,力图从各类“常用社科文献”的概念、历史、类型、特点、典型举例诸方面,次第展开。通过这一特定形式的原原本本的揭示,在使学生和读者掌握了常用文献信息源的基本知识和传统检索方法的同时,又辅助以当前新型

的电子信息源的修养和学习,这样必能大大加强读者和用户对常用文献信息源的深刻把握和驾驭能力。

在编写《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之初,我们曾经特意写了几条说明,现在看来,其中的三条似乎仍有必要在此一一全文列出。

第一,本书的体例安排,依“编”、“撰”有别之义而略加变通。清代大学者章学诚云:“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文史通义·书教上》)这是前人从形式和性质方面着眼,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所有文献区别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依照章学诚的基本观点,“记注”是指官府档案或原始资料;“撰述”是指具有一定体裁的著作。换言之,“记注”就是史料的记录,而“撰述”则是创作性的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编”和“著”,乃是昔日章氏这一观点的延伸。正是沿用此义,本书区别为六编(初版为五编):第一编、第二编为“撰述”部分;第三编、第四编为“记注”部分;第五编是不同形式的常用工具书;第六编则是计算机背景下的电子信息资源及其检索途径。

第二,本书研究对象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常用文献信息源。既然是“常用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所有的、全部的,而是有所区别、有所选择。因而,由此产生在某些学者看来属于有此无彼之憾事,是难以避免的。

第三,既然信息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和运动的规律与特点,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既不应该有空间上的局限,也不应该有时间上的隔阂。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研究今人常用的现代文献信息源的同时,还把视觉投射到那些虽经千百年大浪淘沙而依然闪闪发光的极具生命力的传统文献信息源。

我们这部《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最初问世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在刚刚面世的初版中,也蕴含了编著者之外的其他许多人的辛勤劳动。例如我们不但吸收了北大师生们的宝贵意见,也吸收了社会同行、专家

和学者们的赐教。从 2000 年到如今,转眼六个春秋过去了。这些年来,《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在教学实践和读者的读书治学中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尤其得到了高校广大师生的厚爱和肯定。作为本书编著者,我们实在感到有些诚惶诚恐。

与时俱进,势在必行。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初版的《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已经不能适应当前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和读者自学了:从主观上检查,主要是由于编著者自身水平所限,致使本书在初版时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若干遗憾之处;从客观形势看,出版以后到现在虽然仅仅是短短几年,但我们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由于近年来科学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以及在此背景下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显然已经到了必须修订的时候了。承蒙读者的厚爱和热情建议,我们根据时代特点和需求,并结合以往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切身体会,对原书内容做了认真的订正、修改和增补。概括起来,这次修订版的主要变化有以下四点:第一,因历史发展等因素,订正和弥补了原书中一些不当、不确之处;第二,考虑到教学和自学的需要,我们在每章正文之后增列了旨在进一步开拓读者学术视野的“课外参考文献”;第三,同样是考虑到教学和自学的需要,我们在每章正文之后,还增加了旨在启发读者进一步研究的“思考题”;第四,基于 21 世纪是计算机和网络时代的社会背景,我们特意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第六编电子信息源”,将近年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网络信息源和非网络信息源,一并纳入读者视野范围之内。

适值《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修订版问世之际,我们觉得仍有必要摘录初版“导言”中的一段文字“老话重提”:“由于我们其他方面的教学、科研任务较重,当然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水平有限,因而,此书问题一定不少。好在崇山峻岭,不拒坏土;宏伟大业,重在参与。”我们衷心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专家、学者、高校师生的建议、批评,衷心希望能够及时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吝赐教。

我们相信,在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及各个方面的“建议、批评”和“不吝赐教”的厚爱中,本书编著者一定会和这部教材一起从中获益匪浅,一定会由此得到更加健康的进步。在此,请允许我们诚心诚意地向帮助过我们的专家、学者和同志们表示由衷敬意,借此机会,也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初版编辑王燕来、本次修订版责任编辑宋安莉等同志表示诚挚谢意。

《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修订版)的编写分工是:王锦贵负责本书框架、体例及统稿,并撰写绪论、第二编、第三编;王波撰写第一编、第五编;张积撰写第四编;刘耀撰写第六编。

编著者

2006年6月16日

北京大学燕北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编 著述信息源(上)	(1)
第一章 丛 书	(1)
第一节 丛书演进	(2)
第二节 丛书类型与特点	(5)
第三节 典型丛书解析	(8)
第四节 丛书检索	(18)
第二章 总集、别集	(21)
第一节 总集、别集源流	(21)
第二节 总集、别集类型	(24)
第三节 总集、别集特点	(26)
第四节 总集、别集举要	(28)
第五节 总集、别集的检索利用	(31)
第三章 全集、选集	(34)
第一节 全集、选集概述	(34)
第二节 全集、选集类型	(38)
第三节 全集、选集特点	(39)
第四节 重要全集、选集介绍	(41)
第五节 全集、选集检索利用	(47)
第四章 论文集	(50)
第一节 论文和论文集	(50)
第二节 论文集类型	(52)
第三节 论文集特点	(54)
第四节 论文集举要	(56)
第五节 论文集检索	(58)

第二编 著述信息源(下)	(61)
第一章 传 记	(61)
第一节 传记历史	(61)
第二节 列传类别	(65)
第三节 传记检索	(69)
第二章 史 志	(79)
第一节 史志简史	(79)
第二节 史志类别与内容	(84)
第三节 史志特征与价值	(89)
第三章 政 书	(98)
第一节 政书简史	(98)
第二节 政书类别	(102)
第三节 “三通”解析与“十通”检索	(106)
第三编 史料信息源	(112)
第一章 方 志	(112)
第一节 方志沿革	(112)
第二节 方志类别与体例	(117)
第三节 方志内容与特点	(119)
第四节 方志价值与局限	(124)
第五节 元明清方志述略	(130)
第六节 方志目录及应用	(132)
第二章 档 案	(136)
第一节 档案简史	(137)
第二节 档案属性与作用	(139)
第三节 国家档案全宗内档案分类	(142)
第四节 档案管理机构	(145)
第五节 档案开放与检索	(148)
第六节 档案馆一览	(151)
第四编 资料信息源	(158)

第一章 参考资料	(158)
第一节 名称与渊源	(158)
第二节 编纂与体例	(168)
第三节 重要资料书介绍	(179)
第四节 检 索	(183)
第二章 报刊资料	(187)
第一节 报刊源流	(187)
第二节 报刊资料索引	(190)
第三节 报刊资料的检索	(192)
第五编 咨询工具信息源	(198)
第一章 书目	(198)
第一节 书目发展史	(198)
第二节 书目类型与特点	(201)
第三节 书目举要	(203)
第四节 书目的检索利用	(206)
第二章 索引、文摘	(209)
第一节 索引、文摘源流	(209)
第二节 索引、文摘的类型与特点	(212)
第三节 索引、文摘举要	(215)
第四节 索引、文摘的检索利用	(218)
第三章 类 书	(221)
第一节 类书沿革	(221)
第二节 类书的类型及特点	(223)
第三节 类书举要	(225)
第四节 类书应用	(228)
第四章 年 鉴	(230)
第一节 年鉴简史	(230)
第二节 年鉴类型	(234)
第三节 年鉴特点	(236)

第四节	年鉴举要	(237)
第五节	年鉴功用	(239)
第六编	电子信息源	(242)
第一章	非网络信息源	(242)
第一节	光盘信息源概述	(242)
第二节	光盘检索	(245)
第三节	光盘检索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257)
第四节	光盘检索系统	(260)
第五节	国内主要光盘数据库介绍	(286)
第六节	国外主要光盘数据库介绍	(295)
第二章	网络信息源	(299)
第一节	网络信息资源概述	(299)
第二节	网络信息检索	(303)
第三节	图书馆馆藏目录	(321)
第四节	联机检索系统(Online Retrieval)	(324)
第五节	网络电子书、报、刊	(329)
第六节	网络参考工具书	(338)
主要参考文献		(342)

第一编 著述信息源(上)

第一章 丛 书

丛书,是汇集两种或两种以上单本著作并冠以一个总书名的一套图书。又有丛刻、汇刻、合刻、丛刊、丛钞、丛编、全书、集成、集编、大系、文库、汇刊等各种名称。丛书通常是为了某一特定用途,或针对特定的读者对象,或围绕一定的主题内容而编纂。

一套丛书一般有相同的版式、书型、装帧等,且多由一个出版者出版,除少数丛书一次出齐外,多数为陆续出版。

丛书可以分辑出版,每辑包括若干种单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也可以不分辑直接分册(单本)出版。丛书中的每个单本称为“子目”,都是独立的一本书,有独立的内容、独立的书名。但属于同一种丛书的各单本之间又常常是互相联系或具有某种共性的,如中国古籍中的辑佚丛书,所收各单本都属辑佚性质的书。

判断一部书是否为丛书,除了看其名称,更重要的是看它的内容、结构。许多不叫丛书、丛刊或丛刻等名称的,实际是丛书,如明代陆楫所编的《古今说海》就是一例。相反,有些文献虽称作丛书、丛刻之类,其实并非丛书,如最早使用丛书之名的唐代陆龟蒙所撰的《笠泽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

据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有十多万种,而丛书所收录的古籍约5万种左右,占全部古籍的三分之一。

第一节 丛书演进

丛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丛”，《说文解字》解作“聚也”，就是“汇集”、“汇总”的意思。另外，“丛”还含有“丛脞”的意思，即细碎、繁琐之意。“丛书”两字连用，最早见于唐朝韩愈的《剥啄行》一诗，其中有句云：“门以两版，丛书于间。”但此处的“丛书”还不是书名，意思是“聚集着许多书”。“丛书”第一次用作书名是晚唐诗人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其序云：“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不遗大，可知其所容也。”显见该书是作者的诗文杂著，是因为其丛脞细碎才这样命名的，所以它仍然还不是后世所谓的“丛书”。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丛书，清代乾嘉学者一般认为始于《百川学海》。《百川学海》由左圭辑于宋代咸淳九年（1273），共10集，收书百余种，多为唐人野史杂说。清代光绪时，缪荃孙等发现早于《百川学海》的《儒学警悟》也是一部丛书。《儒学警悟》共40卷，宋太学俞鼎孙、俞经编。此书罕见，只有抄本，以致编纂《四库全书》时亦未见，不知其为丛书。此书辑成于宋代嘉泰二年（1202），收6人的6种著作，先《百川学海》72年，理应推为丛书之祖。关于丛书的起源，还有多种观点。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萧齐时陆澄编辑的《地理书》是丛书之祖。今人刘乃和等更溯源其上，认为《尚书》、《礼记》也都可以算作丛书。当前通行的看法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大量编纂并长期保存丛书是不大可能的，将宋代俞鼎孙、俞经辑成的《儒学警悟》视为丛书之祖，比较确当。《百川学海》作为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流传较广，在丛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丛书自宋代产生后，至明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化；不仅有普通丛书、个人丛书，还出现了小说、戏曲等方面的专类丛书。这些丛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比较有名的如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籍》、程荣的《汉魏丛书》、息机子的《元人杂剧选》等。其中常熟毛晋刊刻的